

2010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 编



中国城市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2010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常州大学郑也夫沈原 潘绥铭 编

藏书章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北 京 ·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0年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编.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074-2363-1

I. ①2… II. ①郑… ②沈… ③潘… III. ①社会学—文集 IV. 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8367号

责任编辑	宋 凯(booktaste@163.com)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 40 号(邮编 100039)
网 址	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 63454857 63289949
发行部传真	(010) 63421417 63400635
发行部信箱	zgcsfx@sina.com
编辑部电话	(010) 52732085 52732055 63421488(Fax)
投稿信箱	city_editor@sina.com
总编室电话	(010) 52732057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
字 数	359 千字 印张 13.25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举报电话: (010) 52732057

前 言

这是本论文集第八卷。

今年三系共完成硕士论文 124 篇。入选本集八篇。其中北大四篇，清华两篇，人大两篇。

选编这部文集的时候，心中很是感慨。一晃八年过去，我们送走了多少同学啊。今年为同学送行的晚宴上，好几位同学醉了。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且醉一回吧。有个老师提议，我们先撤，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一会儿他们会哭的，我们在这里他们拘束。

是的，今晚乃至三四年来，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常常和同学们说：文科教育三件事——读书、思考、写作。社会学要特别加上一件：社会调查。四大件中，写作和其他三者很不同，就是写作最为综合。它既提升又反映着四大素质。离开了读书、思考、社调，怎么可能写好论文呢？所以说，论文是关键，是能力的最大锻炼，是能力的集中体现。

但是从编辑论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论文写作远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其中既包括导师，也包括学生。对教师而言，忽视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就是忽视了执教的核心手段。对学生，问题就更复杂了。肯定有很多同学会想，我日后不准备搞学术，花这么大力气写论文作甚？全世界所有名牌大学的多数毕业生，不例外地会选择学术之外的工作。不待见这样的学生，就是歧视，就是偏执的“学术主义”。但是即使是对于一毕业就跳离象牙塔的学生来说，论文写作仍然是我能想象到的在校期间的最好锻炼。写作论文的过程，会迫使你读书，但不是沉溺于读书，而是既懂得了积累的意义，又明白了吸收的紧要；会促进你放开想象的双翼，不然论文是不会有新意的，但同时又必须精密推敲，严谨措辞，不然就是杂文散文，绝非论文。一个真正

认真写过论文的同学，无论日后做官还是下海，都和没有认真做过论文的人有极大的不同。那是一种全面的、难于一言蔽之的锻炼，他的思维变得清晰、缜密、深入了。同学们常常未能将毕业论文放在适当位置的主要原因是时间。学习课程时，论文选题未提到日程，课程一完，就发现择业的压力迫近了，很快就陷入求职的氛围而不能自拔。我出个主意，就是将论文选题的时间大大提前。进校不久，就要想着这件事。意识的功能其实有限，很多绝妙的想法是有意无意间邂逅和萌生的。早早地将选题的念头放在潜意识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早点开始惦记，必有所获。

论文的地位要大家一同去提升。将荣誉、敲门砖、吹牛的资本，都建立在论文的质量上。我们搞这部文集的用心，其实也在这里。八年跋涉，孤掌难鸣；疑东风唤不回，觉南音耳边生。刚刚听到，南方几个大学的社会学系也在筹划搞“社会学硕士论文选”，切望此事成真。提升社会学的品质，要从学生做起；提升学生的品质，要从毕业论文做起。

郑也夫

2010年8月3日

目 录

前 言.....	1
消费时代的社区整合	
——以西双版纳傣寨的家宅换代为例.....	李 耕 1
汶川地震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	
——对四川 S 村的个案研究	李睿婕 42
社会的嬗变:以燕市一个业主联合组织为例	刘月雯 97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社会资本重新建构问题研究.....	张亚群 152
农民工职业病问题研究	
——以深圳建筑爆破业工人为例.....	吴 姣 204
一个山西村庄的家庭结构变迁:家庭生命周期的	
视角.....	徐晓锋 253
某示范中学高一六班.....	汤 宁 306
工人网络与工厂治理	
——基于南方服装制造业的研究.....	张惠强 364
附录:三系 2010 年硕士论文题目汇总.....	412

消费时代的社区整合

——以西双版纳傣寨的家宅换代为例^①

李 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7 级

指导教师 朱晓阳

第一章 问 题

和全国很多农村地区一样,部分西双版纳傣族村寨也在经历动力的非农化转移——青壮年离家谋生,留守村庄的主要是老人和儿童。但凡亲自到访者都感受到,此地边区乡风之文明、村容之整洁,以及公共生活质量,要在内地“空巢”村的平均水平之上。这一对比值得人们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带入更具普遍性的考量。上世纪 40 年代,田汝康先生着手德宏芒市傣族研究,其问题意识的形成,也受到了边区与内地社会风貌之差异的影响:“摆夷社会为什么这样安静和平,摆夷生活为什么这样陶醉迷人,甚而摆夷面貌为什么这样肃穆雍容。村寨里找不到争吵的骂声,生活中很少有欢的集体,面貌中不常见忧愁的表情,——引起这些结果的原因就是摆。”(田汝康, 2008:100)田汝康认为当地人所热衷的宗教活动“摆”揭示了该地区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基础:作为全员参与的终极财富消耗,“摆”以宗教价值克服了人与人的身份地位差异,社会得以整合。版纳傣族社会历来亦有与“摆”类似的“赅”之习俗,然而,近年在版纳傣族地区

^① 本文的田野调查得到教育部应急课题“农村实质经济对金融危机冲击下农民工返乡生计和发展的影响”(课题号 2009JYJR061)的资助。

进行了长时段和多地点比较观察的学者指出,宗教在版纳傣族社会逐渐失去其绝对重心地位,社会生活日益“世俗化”(谭乐山,2005;龚锐,2008)。佛教规束有所疏松,以往积极的宗教实践愈发成为被动例行的习惯。当地人所关切的不再局限于虔诚信仰支配下的“修今生为来世”,很大程度上已转入工商业经济活动刺激下的现世“投入一回报”程式。在主权国家的现代化轴线中,少数民族社区已被纳入新的格局,剧烈的社会变迁要求研究者循着前人的探讨进一步探求当地的社会文化逻辑。

调研的三个月中,笔者试图寻找比较合适的分析入手点,即在文化体系中有支配力且被人们所重视的文化“焦点”,结果发现,家宅的更新换代能满足上述条件。傣族的传统家宅形式“竹楼”,是傣文化适应生态环境的集中体现。竹楼成为傣族生活最具有代表性的符号之一,展示出当地族群的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家庭形态和价值观念等,以至于研究人员常以“竹楼文化”作为傣族文化的别称。但最近各地的趋势却是告别竹楼,家宅在近年当地人心目中紧要地位的具体体现是家宅的换代。各家各户只要有资金,都急于将竹木结构的住宅拆掉,在原址上建造新材质楼房,并历经多轮改造和家什添置风潮。

就意义而言,家宅在当前国内社科人文研究中是相对边缘的主题,多数成果为零散的描述。另一方面,从普遍性的角度来看,盖房子在全国很多农村地区都是家里一等一的大事,消费攀比风气常见,借助在傣寨的观察,本文区分出“对抗型”的竞争和“模仿型”的竞争,从社区整合的角度给“攀比”补充一种新的文化解释。现今各地开始注重“社区建设”,与汉地村落传统差异较大的傣族村社共同体,在面临“变迁”压力时,有着对主流社会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反应方式。从“边缘的传统”入手梳理边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脉络,或许有助于开拓文化批评的视野。

本文的基本判断包括:房屋换代以及其他的家庭财产增值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和社区景观的更新。更关键的是,在消费风潮不断兴起的同时,消费作为共同体里的社会再分配方式,部分地沿袭了

同“摆”一样的性质,即财富的集体消耗。以往人们重来世,核心关系是人神交流,而现在人们更重现世,在“仿照消费”的时代,人神关系的核心地位被人与物的关系所侵占。

第二章 研究综述

一、理论范式

(一)世俗化与惯习

前文提到有研究者以“世俗化”来统领傣族社会现实,此概括虽然简洁,但还囿于“传统—现代”、“神圣—世俗”等粗线条的陈词,对于现象背后的社会构成和历史进程的讨论不太清晰;另外关于“变迁”,还有一种从惯习、能动性、结构、实践出发的范式阵群:主观行动与系统的决断在持续互动中塑造社会结构,各类资源、话语在实践中被行动者情境性地加以调用支配,将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看成相互独立与相互依存的两个体系,持久的可转移的文化禀性在更新中延续。这类思路注意到了吉登斯所谓结构的二重性,具体到文化人类学的操作,则把以“因果—功能”为整合模式的社会体系与以“逻辑—意义”为整合特征的文化体系拆分开来,从而结合了机制分析与结构分析,是当下关于“变迁”的一个比较流行的讨论路径(格尔茨,1999;布迪厄,2003)。但是,社会过程与文化过程不同结构下的实践,将很多原本应该担当的解释轻松摆脱掉而推卸给“具体情境”。况且,对于一个“包打宇内”的框架,不需要再用一个西南傣族村落的案例去重复论证。所以,不管是“世俗化”的整体趋势还是更新着的“惯习”,在此处都被视为宏观层次的共识、无须赘言的预设和现实背景。下文试图通过与更中观的理论架构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来修改进而搭建适宜的讨论路径。

(二)等级结构

褚建芳(2005:18)认为,田汝康的傣族研究中只强调当地人好施

舍、爱散财的一面,事实上当地人也有强烈的期待回报、为来世做储积的功利的意识。从人一神及人一人的施与报中,他观察到,当地社会的交换被等级和辈分所笼罩,“这种等级观念已经渗透在当地仪式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之间社会行为与交往的规范和逻辑,形成了一种等级结构中的交往规范与伦理秩序。”(褚建芳,2005:342~343)等级结构中的伦理准则即“道义互惠”——根据等级地位的不同而采取不同内容与规范的施与报的关系。具体来说,等级地位高者要承担庇护与福佑的责任,等级地位低者则要晋献虔敬与顺服。而相同等级地位之间的主要关系被定位成“竞争”,“他们之间几乎不需要以此易彼和互通有无,而要竞争相同的资源,从而,他们之间不是互补互利式的道义互惠关系,而是相互对抗的竞争关系”(同上:418),每个人或群体单位都要依照社会对其的角色期待来操作相应的施予与报偿。

“等级结构”作为一种强调社会关系之差等的结构逻辑,和“差序格局”一脉相承。阎云翔(2006)在讨论“差序格局”时,曾认为“差序格局”概念里,“先于个人存在的伦理纲纪体系本身及其等级制特征”一直被忽视了,多数学者都只看到人际关系有“差”而忽略了社会结构有“序”。“等级结构”避免了上述盲视,但它本身也有如下局限性和偏颇。

首先,同级“对抗竞争”关系的论定,将视野局限在了礼仪,若注意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的情形,实际上至少应该修正为竞争—合作的复合关系。如前文所说,傣族社会在历史上有公社制的浓厚色彩,内部互助传统深远,一寨之内的公务如造路,私务如盖屋等,总是全寨人一起参与,通力合作而成。实际上竞争、冲突、合作、同化等几大基本关系类型在各个社会都是相辅相成的。立足于村社共同体的特征,合作、同化则是普遍而常态的关系。等级结构的论说涉及了竞争关系,但忽略了合作、同化关系,或者需要可以另外的方式加以补充。本文区分出了两种竞争:“对抗争夺”型与“模仿”型竞争。前者以排斥性的争夺稀有资源为特征,意图在于超越他人而突出,后者的行为则是模仿性的,争取与他人相同,避免因落后而突出。“等级结

构”将竞争定位于“对抗争夺”型的，没有涉及同质性社区中非常普遍的模仿式竞争。

其次，等级间的庇护主义观，与“等级”自身的界定相违背。褚建芳认为，当地人神之间的赎佛行为及信仰，平民与官僚系统之间上交负担与再分配的行为及规矩，都存在施—报的逻辑，类似于我们在各个场景中都很熟悉的“庇护主义”（孙立平，2004）、“庇佑—顺服关系”（斯科特，2001）。

“等级结构”中的“等级”所指宽泛，“本书中的等级概念是一种基于社会分化并涉及权力、特权、权利以及责任与义务的差异”（褚建芳，2005：415），甚至暗示类别就是等级，“这种不同的类别可以被看成是各种不同性质的等级，因为任何不同的类别都会被人们理解为一种涉及不同特权与权力的远近高低、大小多少的不同等级。”（同上：417）正如其书中所认可的，“差异总是被理解和解释为一种多少、大小、高低、贵贱、圣俗之类的等级关系。”（同上：404）“没有差异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同上：417 脚注）。只要有社会，必然有等级。承接上面等级之间关系的讨论，庇护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分化的主位逻辑。然而这显然有悖于斯科特等庇护关系研讨者的类属意识，也有违于经验现实。将纵向等级间关系设置为“庇护”关系，其实沿袭了指涉资源配置权的传统等级观，与宽泛的“等级”定位相矛盾。

整体来看，“等级”带来“秩序”的言论，确认了“明分使群”、以分化来达到社会整合的合理途径，却不擅长解决伦理秩序与个体意识之间、控制与自由之间的张力问题。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新正统与旧正统在当地发生并接，刚性的伦理纲常越发松懈，“身份社会”经历着缓慢的改变，当神的再分配角色不再受人重视，今世赞助来世生活的理念逐渐失去影响力的时候，纵向庇护—横向竞争的逻辑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级”标准是否有新的宿主？“等级”是否依然足够说明新生活的逻辑？

上述偏差和悖论束缚了“等级结构”所期望的普遍性解释力，借鉴之余有必要采取一个口径更宽的视角。依据当地社会特征和现能掌握的资料，本文尝试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里有着内在亲和性的两

个古典套路——“人文区位学”和“结构距离”，以补充上述讨论范式。

（三）结构距离

在相对封闭的历史地理环境下，版纳地区曾长期保留了稻作经济类型的农村公社，至今傣族村寨社区的物理景观和高度整体化的构成，依然能反映出社会如同“有机体”的经典社会学比喻。与之相关联，虽然从都市研究、定量研究起家，但“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①将社会的有机构成视为它的基本前提之一，并习惯将社区这一基本的人群聚合单位看做是内部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整体。人文区位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简而言之就是环境影响下某一区域内人类群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占据的“位置”和相互联系。它的立足点在于，区域、位置等空间关系能够明确地体现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指数，而“物理距离”又经常是空间关系的索引，那么即可用计量学的方法，从“位置”、“距离”来研究社会^②。人文区位学中比较关键的概念有人口、相对静止的位置（Position）和动态的流动（Movement）等，同时注重应用历史和个人生活口述的方法。它和同一时期流行的结构功能论很容易连接到一起，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社区研究路径就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2002）。人文区位学倡导者本身曾明确指出过其最大局限，在于人类有自我意识、记忆等复杂心理，所以人类行为无法全部还原为客观恒定的如同物理化学元素般的活动（Park, 1926）。反映于区域上的经济行为秩序如集市间距可以用统计的方法来研究，可一旦涉及价值观念，如亲疏感，其距离就难以单纯“科学”量化统计了。

生态、位置等关键术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的努尔人研究。和人文区位学一样，埃文思—普里查德也强调是生态环境决定了努尔社区的分布，也习惯从运动的

① 此处主要指中国社区研究影响巨大的以罗伯特·派克等人代表的古典人文区位学。

② 以“区位”代替“生态”的中文译名比英文原名 Human Ecology 更直接地体现了其研究侧重点。

角度来标明团体身份所塑造出来的社会关系,例如当地政治结构中分裂与融合的趋势。

埃文思—普里查德也指出,人类社会时间和空间的集体感知往往无法客观,都是结构性的或受制于情境性的社会结构。人们经常通过地方性群体之间、社区之间的关系来测度时间和空间。和人文区位学的回避态度不同,根据在努尔社会发现的上述规律,埃文思—普里查德正面给出了“结构距离”的概念——以价值观形式体现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群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在社会—心理—时空之间建立了联系。

然而,此处“结构”的界定是狭义的——“具有高度一致性与恒久性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304)“高度一致性与恒久性的群体”,即氏族、宗族、年龄组等制度化的社会关系所划分出来的社群单位。如果社会关系是非制度化的,或者在群体分隔并不明显的情境下,距离就不存在了吗?埃文思—普里查德强调他的定义是故意有所局限的,“我们承认还可以以其他方式来对结构加以界定。”(同上:308)所以若想更灵泛地运用“结构距离”的概念,或许需要将狭义“结构”扩展恢复到它更常见的含义上来:一个社会中各种标准化关系的整体,集合了各种社会制度和身份关系。那么但凡有不均匀的社会关系存在,不管是群体之间的,还是群体内部,临时的还是永久的,都存有“距离”被观测的可能。

结合“人文区位学”和“等级结构”的启示,本文认为,与区位学的空间距离相比,结构距离是抽象的,但可体现为三种互相联系的形式:第一,社会群体之间“亲疏远近”等主观心理感受和裁定,即心理距离;第二,若将群体关系予以制度化的认可,则出现群体关系中刚性的“等级伦理”,即造成了等级间距;第三,若这种等级规则获得高度认可,且等级的获得是公开且高度流动性的,那么各类人群在同一行为序列上经常处于不同的阶段,即形成了“序列间距”。这样,价值观所折射出的结构,既涵盖了人群属类之间的差别,也将群体行为中所含有的阶段、等级等差异也体现了出来。距离可以是中立的“大”与“小”,也可是带有倾向性的向量,例如自下而上的等级流动。

经过修正的广义的“结构距离”概念虽然不够完备,但能统摄更多的日常社会经验,符合此处讨论的需要,从“结构距离”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关系是本文的整体研究范式。房屋建造以及其他商品的消费竞赛,其实体现了延续了共同体填补等级间距和序列间距的同化性张力。另外加入社会史和象征符号等探索视角,使分析出发点不限于单一的共时性的结构功能论。

二、经验研究概观

现在乡村生活已变得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变化性和异质性(徐勇,2007),各地农村寻常的景象是空巢化的家庭,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以及在家园与城市之间来回奔涌的人潮。一些学者指出,大片村落出现了凋敝的景象,比如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突出的养老抚幼问题,道路、环境卫生等公共物品供应不足或诉求渠道不畅;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弱,等等(彭大鹏,2003;王松磊,2008)。一种观点认为,长期以来的乡村建设“主要强调经济维度的乡村发展,而忽视公共性维度的乡村建设。没有把乡村看作是一个社区,忽视了其认同感、安全感以及凝聚力等要素的激发与整合。”(黄平,2010)显然此处的社区并不是强调一种物理时空坐落里的地域单位,而是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①。共同体在意识层面上强调人与人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归属感,在整合方式上强调即便在缺少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各要素之间也能习惯性地相互适应与调节,达到一种相互合作与依赖的过程和状态。近年来乡村社会的现象讨论林林总总,例如政治精英与社会动员(黄树民,2002)、集体记忆再造社会关系(Jing,1998)、宗族组织传统“复兴”等(麻国庆,2000),种种过

① 关于“社区”与“共同体”二者在国内语境内的变化和关系,参见胡鸿保、姜振华《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另外其文中提到,城市居民也面临着从“单位人”到“社区人”的转换。但城市新兴社区往往是先划定地域,再培育社会心理。而农村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自然形成,不需要重新建设。现在看来,首先农村社区的精神再造已成必要;其次,对农村村落社区以及发达的网络虚拟社区的考察对于城市社区意识之培育也有参考价值。

程机制都涉及与国家权力互动中的社区文化整合能力的重构。然而除了前台的政治喧嚣,还有很多丰富的文本缺乏足够的关注。众多研究细致地清理了社区结构中的权力结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琐事”被偏置。此处对政治过程对社区的塑造不做重点讨论,而从联谊交往的角度来探索开拓社区边界的内生性组织,从消费来展示面对内外变迁时社区施展出来的结构性张力。

古典人类学理论明确提出要将家宅放在文化体系中来看,且此处的文化体系是群体为适应自然环境而营造。法国年鉴学派的涂尔干和莫斯更进一步探索到集体认知层次,揭示出空间分类体系的意义赋予方来自社会。爱斯基摩社会里居住形式虽冬夏两季的交替而轮换,莫斯(毛斯,2003)指出这种变化不能仅仅从生态环境和技术因素来加以解释,冬夏两季当地社会的生计、社会组织、信仰风貌都会发生规律性的波动,房屋与居住格局是体现社会律动的若干音符之一。综观近年人类学对空间的考虑(黄应贵,1995;Low & Lawrence,2003),空间如同万能插件,对空间的研究往往即空间与具体的社会关系如何复合的问题,可在各种类属下讨论,例如躯体化的空间、性别化的空间、文本化的空间、空间与亲属关系、空间与仪式等。阎云翔立足于中国东北汉族农村的调查,概括性地指出住宅内部空间构造的改变标志了当代农民私人生活的三个转型:青年独立、父权衰落和个人意识觉醒。傣楼的卧室改革基本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本文认为除了趋势性的统观外,房屋的结构形式和其象征意义的变迁,还需要更深的历史性解读,而且社区并非封闭的系统,外来因素的影响也要考虑。例如汉族流动建筑队的到来对于当地盖房潮流的技术启动作用,火塘对情感、历史的整合被电视的吸附所替代等。

当代资本主义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或地方自明性的削弱,普遍地构成了人类与家庭地点所无法改变的疏离。或许正是出于对这个倾向的警惕,人文地理学家曾特别强调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的对照。place 往往充满人文意涵,是价值观、感知、记忆等的起点、伴生或产物。段义孚指出,和变动不居的空间相比,一种

“停顿”的姿态使“地方”得以成为价值观念的中心(Tuan, 2001: 138)。巴什拉(2008)认为家宅和空间所存储的时间记忆结合在一起,丰富了人的内心世界。上述主张虽然看到了家宅作为“地方”,含有与 space 相对立的特殊意味,但也被指责为“唯心论”,即认为个人心灵可以自由统摄经验世界,不受历史特殊权力关系所影响,不受社会经济限制,社会即便被频繁提及,也只是含混的背景,对于规则、组织、制度,以及个体与它们的结构关系,都没有做更多明确的说明(Pred, 1999)。出于对社区整合的关注,本文在简略论述家宅本身的象征意义外,着重讨论盖房竞赛这种群体行为。盖房竞赛以变革的形式保持了共同体行动协同的律令,是共同体应对社会分化的一种结构惯性之表达。

卢晖临(2006)通过对皖南农村的长时间调查,认为裹挟农民的盖房竞赛“潮流”、潮流背后的平均主义心态,都和集体化时期的生活经历有着直接联系。“在革命前乡村‘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里,农民对私有财产有着一种天然的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对于财产界限的清楚认识;同时,他们将等级制结构视作一种天经地义的社会存在;他们抱持一种个体责任观,并用命运来解释人力左右不了的幸福和苦难。”(同上:158~159)土改彻底冲垮了这套体系,被压抑的农民的平均主义借助“阶级剥削”、“翻身”等新的话语浮现出来,为合作化做好了铺垫。集体化时期酝酿了今日农民“大家都是社员,谁也不比谁差多少”的观念。这种“平等”的观念,并非西方现代平等观念的直接舶来品,却和集体化时代的社员经历、平均主义有直接继承的关系。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近年住房的兴建成为不折不扣的地位竞争仪式,并营造出一种逼迫家家户户参与到竞赛当中的“形势”。

卢晖临的研究以“现在”向“过去”提问,梳理了“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的历史际遇。“平均主义”经过共产主义动员之后到底是恢复的过程还是重新塑造的过程?集体化时期“平等”口号之下社员之间是否真的平等?如今在“人人都一样”的借口说辞下,为什么“平均主义”的案例体现的是几家人“斗气”式的争上风,即“我要比你更好”,而不是真正的“人人都一样”?在这些关键环节上,该研究解释逻辑

上的起承转合过于匆忙。

集体化作为一个社会结构被深刻改变的历史时期，对于观念的改变正如卢晖临所说影响深远。版纳傣族地区也经历了集体化时期。份地一负担等“原始共产主义”观念在经过初期改造的各种对付或抵抗后，终究在制度上被“内部瓦解”。头人们被“打倒”，新的富农、中农阶级被制造出来。据当地村民回忆，变成“社员”后，生活变得困难。直到联产承包后，经济生活才恢复元气。但是，如前文所述，历史上的村社共同体本身就浸润在浓厚的平均主义观里，所以平均主义的来源不仅仅是集体化时期阶级不一的社员身份，更为根本的或许还是农村公社共同体的历史。另外从文化上来说，此处无暇比较汉族农民与傣族农民的命运观之具体异同，但小乘佛教的信仰，如因果轮回，今生由前世安排而来，强调通过一己之力的自我修持来最终达到救赎，与“命”之既定，“运”之可变二念有相通处。而汉地农村所没有的“赎佛”观念，又突出了傣族地区以消耗来平衡社会再分配的独到方式。本文将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为盖房竞赛以及更本质的攀比现象补充一种文化解释。

第三章 调研过程和调研地点简介

一、调研背景

经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介绍，我于2009年3~5月在曼G寨（当地汉语习惯称自然村为寨）进行田野调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先后多次组织师生前往勐海县曼G寨进行集体调研，积累了数十万字的公开出版的及非正式的文字材料，内容涉及该村的方方面面，以司法和习惯法案例居多。文中若涉及引用这些材料，都加以标示。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本科生于2005年也曾赴该村短期调研，写成了一些未发表的文字材料。除了学术专著、游记、档案之外，本研究在开始之前，即深深得益于上述单位的调